

高市政府开年缘何动作频频

■王成文

开年以来,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展现异动:对内,宣布解散国会众议院,提前举行选举;对外,接待访日外国领导人,并派遣要员密集出访多国。这一系列内外动作逻辑相通,勾勒出高市政府“内政突破常规、外交扩展空间、内外政策联动”的战略意图。

根据高市政府1月19日公布的时间表,众议院于1月23日解散,1月27日发布选举公告,2月8日进行投票。高市声称,若执政联盟失去众议院多数席位,她将立即引咎辞职。她还公开表示,将加快《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的修订进程。此举打破了日本政坛多项惯例,引发广泛关注。从选举周期看,日本众议院任期为4年,本届任期至2028年10月届满,本次解散距上一次选举仅过去15个月,属于罕见的“中途解散”。程序上,国会开幕当日便宣布解散众议院,是60年来首次;从解散到投票仅间隔16天,大幅压缩各党派准备竞选与舆论发酵时间。

高市解散众议院的时机选择颇具算计。日本广播协会1月10日至12日的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仍高达62%。这些支持率并非源于经济政绩,而是源于她强硬对外政策及言论在国内煽动的右翼民粹情绪。2025年底,高市政府强行通过规模空前的补充预算案,导致财政赤字压力增大,引发国内普遍不满。在野党趁机发难,计划提交内阁不信任案并展开追责。正如评论所言,高市“不断制造并吸收社会中的右翼与不安情绪,以捞取政治资本、勉强维持权力”。

高市急于将当前虚高的支持率转化为国会席位优势,甚至不惜将选举结果与个人去留绑定。其近期目标,是转移内政矛盾、摆脱“跛脚鸭”困境。提前解散国会可打乱在野党进攻节奏,转移公众视线,从而规避潜在执政风险。

从长远看,高市试图借机为推动激进右翼议程扫清障碍。作为右翼保守势力代表,其主要目标是彻底摆脱战后体制,推动日本成为所谓“正常国家”。若选举获胜,特别是若能掌控国会两院三分之二多数,高市就将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彻底解除日本扩张军力的法律束缚。

同时,高市政府四面出击,推动日本外交布局,在多个领域进一步与美国捆绑,并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加强合作。对内以此作为政绩拉抬选票,对外

为日本加速“再武装”争取空间。

1月13日至14日,高市在奈良会见韩国总统李在明,宣称将推动日韩关系迈向更高水平。几天后,她又接待来访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将日意关系提升为特殊战略伙伴关系。12日至19日,日本防卫大臣、财务大臣相继访美,重点就强化日美军事同盟、推进日本对美投资进行会谈。日本外务大臣则展开“穿梭外交”,接连出访以色列、菲律宾、印度等国。其间,日菲签署具有半盟友好性质的《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日印则表示将强化全球战略伙伴关系。

高市政府开年的一系列激进举措,包藏日本右翼势力急于巩固国内权力、推动“再军事化”的政治图谋,也是无视历史教训、违背和平发展潮流的险棋。



日防务政策“暗度陈仓”

■观山海 迟海

日本现代国防体系的构建,根植于二战日本战败后无条件投降、被强制解除武装的历史起点,这一起点源自其侵略战争的罪责,被《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文件明确记载,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遵守这些文件,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也是其重返国际社会接纳的前提。

然而,在美国长期包庇与纵容下,日本政府持续淡化侵略历史,蓄意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从冷战至今,日本不断为军事扩张扫除障碍,渐进提升自卫队实力,并逐步形成一套运作模式:一面借助或制造外部危机炒热安全问题,兜售“受害者”言论,以“存亡”叙事推动民意转向;一面通过语义模糊、定义重构等“隐形突破”方式,规避直接修宪可能引发的国内外反弹。

在这一过程中,日本逐步为其防务政策转型铺路,不断突破原有法律与舆论限制。

在防卫政策上,日本刻意模糊“自卫”与“先发制人”的界限,抛出所谓“反击能力”论调,大幅降低动武门槛,加剧擦枪走火升级为军事冲突的风险。在装备定义上,自卫队采用具有伪装性的非攻击性术语:将可起降武装直升机、能搭载F-35B战斗机的出云级等具备远洋进攻能力的舰船,称为直升机驱逐舰;把射程远超自卫队需求、可打击他国纵深目标的导弹,包装为“改进型反舰导弹”或“岛屿防卫用弹药”。在动员潜力上,日本推进“官民两用”技术开发,使民用企业成为国防供应链的隐藏支柱,降低军事化进

程的能见度。

在尤为敏感的核领域,日本更是与美国暗通款曲。作为唯一曾遭受核打击的国家,日本虽公开承诺遵守“无核三原则”,但实际上已是一个“准核武国家”:拥有尖端核技术潜力、大量武器级核材料储备及较成熟的运载火箭技术,理论上可在较短时间内跨越“核门槛”。同时,日本又通过《美日安保条约》及一系列防务安排,被纳入美国“核保护伞”之下,避免了自主拥核带来的政治、外交与安全成本。这种双重身份与战略模糊属性,使其成为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中的不稳定因素。

随着自卫队任务性质转向海外干预与主动威慑,日本右翼势力日益公开推动政策突破。关于调整核政策的讨论日趋公开,部分政客和学者鼓吹引入类似北约的“核共享”机制。此前有日本高官公开主张拥核,日本防卫大臣也曾高调参观美军核潜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修改“无核三原则”是“安保三文件”修订的重点内容。日本常规军事力量建设也在为其“准核武装化”铺路。常规潜艇研发中重点投入的锂离子电池、泵喷推进等技术,与核潜艇技术高度相通;计划大规模部署的F-35战斗机已被美国认证为可搭载B61-12战术核弹的核常两用平台;正在发展的远程巡航导弹同样具备核常两用潜力。这些动向显示,日本正以渐进、隐蔽方式获得实质核打击能力。

上图:参加海上联合演习的日本“鹿岛”号训练舰。

日本加速推进自卫队转型

■王大宁

近期,日本以多场美日联合军事演习为背景,加速推进自卫队全面转型。自2022年底通过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文件以来,日本防卫政策已明显突破“专守防卫”,转向发展“先制反击能力”。在持续多年大幅增加防卫投入的支持下,日本自卫队正以全方位、体系化方式加紧转型,内容涵盖编制体制、武器装备、部署布势等多个方面。

编制体制—— 推进联合指挥,谋求 精干高效

日本自卫队在总员额基本不变、保持原有精干特点的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编制体制向高效转型。

海上自卫队预计今年3月完成新一轮重组:废除沿用多年的“护卫舰队”“护卫队群”等带有“护卫”字样的名称,整编为“水上舰队”和“水上战群”作为一线作战力量;退居二线的驱逐舰、导弹护卫舰等组成“巡逻警戒群”,承担基地周边海域日常警戒监视任务;现有的扫雷、运输舰艇整编为“水陆两栖和扫雷作战群”,专注于扫雷、两栖作战及海上投送任务;整合自卫队下属的舰队情报群、海洋业务和对潜支援群及其他涉情报战职能单位,新建“情报作战集团”,强化信息作战与情报能力。

陆上自卫队已完成7支岸舰导弹联队的组建,配备12式反舰导弹,形成对日本全域及周边重要水道的火力网覆盖;驻冲绳的第15旅团已升级为具有快速反应能力的机动旅团,今年将升格为师团级,其司令部负责统筹部署在冲绳及与那国岛等地的电子战和无人机力量;与那国岛、宫古岛、石垣岛等前哨岛屿正陆续部署侦察警戒部队和导弹单位。

航空自卫队则加速组建并部署新型F-35A隐身战斗机中队,2026财年将更名为“天空(航空宇宙)自卫队”。现有的2个“宇宙作战群”拟扩编为约880人的“宇宙作战集团”。2022年成立的“网络防卫队”,已从陆海空自卫队整合网络作战力量,计划2027财年增至4000人。

日本自卫队还加紧组建与完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2025年3月,日本防卫省成立统合司令部,实现“作战指挥一元化”,以提升与美军协同效率。同年10月,该司令部在联合演习中指挥

5.8万人参与跨域作战,运行效率得到初步检验。为增强联合指挥控制、分布式作战及持续作战能力,自卫队正推进“中央云”指挥系统建设,计划2027年前实现指挥系统从师团级到单兵作战平台的数字化联通。

日本还试图打造“单一战区”、整合战区层面的指挥体系:在西南方向成立联合任务部队,统一指挥驻冲绳的第15旅团、佐世保地方队的舰艇及那霸基地的航空力量,打造陆海空情报共享与协同行动网络;组建由陆上自卫官负责的“海上运输群”,整合海陆运输力量,以便在“小型离岛”上分散部署、持续补给。

武器装备—— 侧重远程进攻,前沿 技术赋能

日本自卫队正超越传统“专守防卫”范畴,公开谋求自行发展和多方引进远程纵深打击与远洋进攻型武器装备。

海上自卫队重点打造以“准航母”、大型水面舰艇及先进常规潜艇为主体的打击平台:已完成2艘2.6万吨级出云级直升机驱逐舰的航母化改装,每艘可搭载21架F-35B战斗机;拟配备03式中程地空导弹、12式反舰导弹及搜潜反潜装备的12艘上级护卫舰已全部下水;计划建造2艘2万吨级“超级宙斯盾”战舰,用于搭载“战斧”巡航导弹;最新型大型驱逐舰及部分苍龙级潜艇采用先进锂离子电池,水下续航时间和静音性能显著提升,可垂直发射12式反舰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

陆上自卫队在琉球群岛的前沿岛屿新建驻地,部署新型12式反舰导弹(射程提升至1000千米以上)及中程防空导弹,并计划今年部署高超声速导弹。航空自卫队加速引进美制F-35A



图①:日本自卫队在军演中进行空中投送训练。

图②:日本自卫队装甲车进行射击训练。

战斗机,升级现役F-15J战斗机以搭载AGM-158B隐身巡航导弹;从挪威、美国引进JSM联合打击导弹和JASSM-ER巡航导弹,同时自研射程约1000千米的空基反舰导弹;计划为国产C-2运输机加装智能弹药托盘,搭载多枚空射巡航导弹,变相拥有远程打击能力。

在前沿技术研发方面,日本在2023至2027财年投入约3.5万亿日元(约合226.4亿美元),重点聚焦智能无人集群、卫星星座及太空、网络、定向能、高超声速等新兴领域,以期获得“防区外打击”能力。具体包括:2027年前部署10颗高分辨率光学卫星,以提升自主侦察、导航和通信能力,支持远程精确打击;2025年通过“主动网络防御法案”,打造可提前入侵或摧毁“攻击者”的网络设备;2026年底部署高超声速滑翔弹,2030年前实现超燃冲压发动机技术实用化;有人/无人协同作战进入实机测试阶段,计划2030年前实现“无人僚机”与F-15J战斗机协同作战。

部署布势—— 持续转向西南,注重 日美融合

日本自卫队基地体系正在进行根本性重构,布局重心从传统的“北重南

轻”加速向西南方向倾斜,整体功能由静态防御向动态前沿威慑与反击转变。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期宣称计划在在那国岛部署03式中程地空导弹,就是这一趋势的缩影。

日本持续推进西南方向作战体系建设,对各岛屿功能进行清晰定位:冲绳岛作为指挥中枢、与那国岛作为警戒监视关键点、石垣岛作为八重山群岛作战核心、宫古岛作为先岛群岛“前敌指挥部”、奄美大岛作为军力集结投送基地、马毛岛作为航空要塞,并计划2026年在北大东岛部署移动雷达,力图构筑多点衔接、南北呼应的岛屿基地网。为增强作战体系的功能及韧性,日本加快改造军民两用港口与机场。日本北部与中部基地的功能也相应向支援西南方向作战与后勤保障转型。

与此同时,日美基地融合不断深化。日本西南地区新建的机场、弹药库等设施多为日美共用,日本雷达侦察系统可与美军天基、海基体系配合。驻日美军将海军陆战队濒海作战团、陆军多域特遣部队等新型作战单元优先部署于日本西南方向,聚焦离岛防御与反介入/区域拒止作战,使日本本土及离岛成为美军“第一岛链”作战体系的关键支点。日本自卫队试图在情报、监视、侦察乃至打击链条上与美军高度协同,获得远超自身实力的体系化干预能力。

日本借力同盟搅动地区安全

■李海

日本战后重建和发展军事力量,一直遵循“自主建设”与“借力同盟”的双重路径。近年来,日本更加重视同盟关系构建,持续深化以日美同盟为核心、辐射周边的安全合作体系。通过深度嵌入



美日联合演习中,日本自卫队人员填装迫击炮弹。

主导的地区军事网络,日本试图构建多层次“小多边”安全合作关系,弥补自身在远程打击、力量投送及全球态势感知方面的短板。

作为日本战后对外战略基石的日美同盟,其形态与内涵已发生质变,从最初美国对日本单向提供保护,日益转向双方联合进行前沿部署与主动干预。2015年,日本通过新安保法案,解禁集体自卫权,允许在本土未受到攻击时协助盟国行使武力。2024年,美日大幅更新《美日安保条约》,将双边关系从“美主日从”的防御性同盟升级为“攻守兼备”的军事同盟,双方行动范围与协同水平达到新高。无论是拜登政府,还是再度执政的特朗普政府,美国为推进“印太战略”,降低霸权成本,均持续为日本军事“松绑”,同时督促其承担更多防务责任。

日本在核心装备、关键技术和作战体系上深度依赖美国,这种不对称依赖被日本视为一种“投机资本”,使其更倾向于借助同盟保护,主动介入地区安全事务,针对战略对手展开高风险博弈。通过强化美日军事一体化、扩大同盟行动范围,日本已融入美国“印太战略”布局,甘愿充当美国“一体化威慑”的前沿支点,并借势将“反击能力”确立为安保战略支柱。

日本还配合美国,构建机制化、多层次的“日美+”安全合作网络,以实现同盟体系的辐射与拓展。日本借此与域内外国及国际组织建立“2+2”会谈机制,签署《情报保护协定》《互惠准入协定》《物资与劳务协定》等一系列防务合作文件,不断加强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防务互动。这些各有侧重的双边防务合作,使日本能够依托美国及其同盟体系,针对特定地域或安全议题灵活组合联盟力量,从而在传统军事领域及太空、网络等新兴领域同步扩大自身影响力与行动自由度。例如,日美韩合作侧重于导弹预警信息实时共享、定期联合演训及供应链安全协作;日美菲合作聚焦联合巡航、防务装备技术转让及海域态势感知;日美澳合作则致力于深化后方支援与联合训练。此外,日本正谋求加入“奥库斯”联盟第二支柱,该框架涵盖人工智能、网络安全、量子计算及高超声速技术等先进与新兴军事能力。

为盘活本国军工产业链、检验装备性能,同时巩固与拓展军事准盟友关系,日本处心积虑放宽并强化军备输出,扩展海外军工市场。2023年底,日本大幅修改2014年制定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提出官民一体推进防卫装备向海外转移。迄今,日本已与16个国家签署

《防卫装备与技术转移协定》。2023年出台的“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OSA)计划,成为日本在防务领域拓展伙伴关系的重要抓手。日本试图通过该计划向所谓“志同道合国家”提供国防装备及相关物资,构建“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

近期,日本外务省公布2026财年预算案,OSA计划经费从2025年的81亿日元大幅增至181亿日元,增幅超过一倍。覆盖范围新增泰国、斯里兰卡、东帝汶等印太地区关键节点国家,与此前已纳入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连成弧形布局。援助内容持续升级,已涵盖雷达、巡逻艇、卫星通信系统、长航时无人机及军民两用港口设施等。尤其值得警惕的是,长期作为日本对外政策工具的“政府开发援助”(ODA)项目,其2026财年预算也明显向东南亚及太平洋岛国倾斜,覆盖区域与OSA高度重合,其中“用于与外国展开信息战”的预算增幅高达21.6%。日本试图通过两项援助计划,达到“经济援助巩固合作基础、军事支援强化绑定关系”的目的。

日本参与和推动的诸多“小圈子”式军事合作,具有明显针对性,不仅加剧地区军备竞赛,更催生“新冷战”式的阵营对抗阴云。